



37 年前，费孝通“下本钱”办的这个培训班牛在哪

从“速成班”到社会学“种子”，1981 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留下“经世致用”的精神遗产

“改革开放，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到来。新的社会时代需要社会学的研究，也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了机会。‘八一年南开班’这个词，在社会学圈子内已有了国内、国际名声。只要你提起这个名字，送给你的羡慕的眼光”



▲ 1981 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开学典礼，费孝通正和同学们交谈有关社会学的情况。（新华社资料图片）

这是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开学典礼，台下坐着 54 名学生。这些人完全是“愿者上钩”，是费孝通从其他学校“钓”过来的。

1980 年 12 月 27 日，经费孝通等人协调，教育部以“[80]高教 1 字第 104 号”文件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同时批准南开大学从全国 77 级重点大学优秀大三学生中选拔学员，举办社会学专业班。一些机构也选派了若干旁听生。

南开大学白红光教授当年正是其中的一员，他当时对社会学一点不了解，认准了“费孝通是个金字招牌，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做学问跟着大学问家总错不了。”

除了冲着费孝通的招牌之外，一些学员也有着更深的打算。

“（社会学）不像哲学，是旨在诠释现实、建设社会，所以我就是想学社会学。”当时的学员边燕杰这样解释他参加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动机。在上大学之前，他曾经下过乡，正是因为有这样背景，他在刚刚进入南开哲学系时觉得哲学离自己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现实太远了。

有这样想法的学员不在少数。当时的任课教师何炳济曾经做的一次调查发现，专业班里学过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同学反映哲学太抽象，“空得很”“体系僵化”“解决不了社会实际问题”，与此相反，社会学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比较具体，又是跟人打交道，很可能是一门有前途的学科。

半个留学生

“培训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社会学学科建设急需的人才。”苏宛说，这就需要好学生和优秀的老师。

在苏宛看来，即使当时南开这方面的师资条件是最弱的，但是有了费孝通的支持，就等于举“全国之力”来帮南开办好这个培训班。

苏宛说的“全国之力”，除了招生外，还体现在培训班师资的筹备上。培训班的师资曾经让费孝通十分“头疼”。

当时能给这些学员补课的，一个是老先生，一个是洋教授。无论是请老先生出山，还是请洋教授进门，都离不开费孝通的个人关系。

在国内，费孝通在北京大学潘乃谷（费孝通老师潘光旦的女儿）的帮助下，聘请了雷洁琼、吴泽霖、张之毅等老先生。在国外，费孝通通过同学、著名社会学家杨庆堃与海外联系，再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康，邀请了彼得·布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哲夫（美国天主教大学）、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外籍专家。

早在 1978 年 7 月中旬，就如何恢复社会学，费孝通与邓力群进行了一次长达 2 个小时的交谈，费孝通向邓力群建议，与美籍华人建立联系，获取最新的信息。他提到了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杨庆堃等熟人在美国做的社会学研究，其中一些人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也曾访问过中国。

当时的学员们对大多数老先生并不是特别了解。周雪光就是若干年后在自己做研究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这些老先生的学术地位，以及他们之前做的大量研究。周雪光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主任。1981 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正是他的社会学研究“启蒙”。

相比老先生，洋教授给学生带来的是“现场的颠覆性认识”。“当他（彼得·布劳）在黑板上写出 My theory（我的理论）时，我惊呆了，以前我们都是讲别人说，马克思说、谁谁谁说，从来没人敢说自我自己的。”这让彭华民“打破了原来思维的框框”，原来个人对学科的发展能有这样大的推动力。彭华民从南开社会学专业班毕业后，继续留在南开研究生班攻读社会学，如今她在南京大学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担任院长。

“我们就算半个留学生了。”白红光回忆，“当时在外教课堂上主要的困难是翻译找不到英语对应的专业名词。英语口语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彼得·布劳一看底下学生的眼神就知道学生明不明白。遇到学生不懂的，布劳就在讲台上急得直转。他的课堂先后换了 3 名翻译才让学生们和自己满意。”

尽管这样，彼得·布劳依然对学员们在课堂上的接受能力很吃惊。“我在美国教学也没见过这样的班”，他评价这些本科生的水平比得上美国的研究者。

社会学“黄埔一期”：像蒲公英一样播撒种子

“‘八一年南开班’这个词，在社会学圈子内已有了国内、国际名声。无论在北京还是南京，是台北还是香港，是 Stanford（斯坦福大学）还是 Duke（杜克大学），只要你提起这个名字，朋友送给你的羡慕的眼光。”这是当时已经是北美华裔社会学家协会主席、香港科

本报记者张典标、尹思源

“中国要发展，人民要过好日子，需要有一大批人做研究、出主意。你这个学生坐在那里，也不拿录音机，也不做什么，我真的是心里非常难过。”2018 年 6 月 14 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召开的“费孝通与乡村振兴——第五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在提出继承费孝通“用自己的知识去服务社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治学精神时，回忆起费孝通批评自己的这段往事。

那是 1995 年，李友梅从法国读博回来，正参加北大的一个高级研讨班。见到李友梅没有带做研究的必备工具录音笔，费孝通当时语气很重。更早之前，李友梅是 1981 年费孝通在南开大学开办的社会学专业班的旁听生。

1981 年，当费孝通来南开大学时，他觉得自己“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当时，这位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学术生涯经历磨难之后刚刚“重获新生”，他把此后“意外获得”的每一元视为“一块钱”。这些“钱”，他花得慎之又慎。即使这样，他依然“舍得”为培训班——1981 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学生“花掉”一些。他把这些学生视为“种子”。

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

1978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杜任之率先提出恢复重建社会学的主张，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在更早的 1978 年 3 月 28 日，邓小平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副院长邓力群关于逐渐建立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谈话中提到：“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可以办了。有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胡乔木计划增加的就包括社会学研究所。

对于社会学，胡乔木请的“菩萨”就是费孝通。1979 年春节，当胡乔木亲自拜访费孝通，委托其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这时的费孝通已近 70 岁。

“最好不要找到我头上来。”费孝通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接到带头恢复与重建社会学任务时，他也很忐忑。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社会学重见天日的一天，费孝通心里热乎乎的，可接下来他就犹豫了。

“我原本没有学好，又荒疏了这么久，即使有老本本可据，我也教不了。社会科学必须从自己土里长出来。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得从头做起，决不是唤之即来的。我怎敢轻易承担这任务呢？”社会学荒废了近 30 年，费孝通也担心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后，“历史感”让费孝通还是挑起了担子，“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继续常存的社会。”

费孝通对恢复与重建社会学在组织结构上有一套“五脏”的说法，即建立学会、建立研究机构、建立培养人才的社会学系、设立图书资料中

心、出版社会学的专门刊物和出版机构。

在费孝通看来，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培育人才。而当时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一代社会学者，大多八十岁左右，有很多人早已改行，还有很多人心存顾虑。

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和时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的苏宛等人采取的“非常手段”就是开设短期的专业培训班。“恢复社会学要培养人才很急，从大一开始招要等四年才毕业，太慢了。”苏宛最后建议采用 1958 年南开大学筹办哲学系时的办法——专业培训班，把四年的学习内容在一年内学完。

埋下“经世致用”的种子

“实不相瞒，我是被我的第三代挤成这样的。”老伴有病，费孝通把女儿一家调回来照顾她。人多了，空间就小了，费孝通只能伏在床边的小桌子上写稿。

这是在 1979 年 3 月 15 日至 18 日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上，费孝通讲到自家面临的“人口问题”。紧接着，费孝通说，“现实生活中，这类的问题实在不少，可以设想，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速度不容易取得均衡，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会不断发生。如果我们对于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能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对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较早地有所察觉、有所准备，也就可能减少或避免一些社会损失。”

这次座谈会是为恢复社会学学科做准备。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它的社会问题，比如：劳动、人口、文化、道德、民俗、民族、妇女、青年、儿童、老年、城市、农村、职业分工等，应该有它的社会学……各种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研究。”胡乔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这番讲话，让不少现场的老先生为之振奋。

此时，社会大转型已经开始。这次座谈会的前几个月，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世人面前展开。

197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1980 年，温州发出了全国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共 1844 户。登记后的小商贩们不再用“偷偷摸摸”卖东西了。据统计，截至 1981 年底，全国个体户已达 101 万人。

1978 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1979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为乡镇企业奠定了发展基础。不久之后，农村富余劳动力不再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1980 年 4 月，北京航空食品、建国饭店、长城饭店成为首批获准成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伴随着社会转型，原来持续了 30 年的计划经济正在成为过去。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慢慢能够通过市场来实现，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成长壮大，新的社会阶层也不断成长。

“最早社任之提议恢复社会学的时候，也是预见今后的社会发展需要社会学学科。”苏宛回忆说，这也是 1981 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创办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也使得 1981 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远不止“补课”这么简单。

费孝通对 1981 年的南开社会学专业班一直“灌输”经世致用的理念。1981 年 12 月 13 日，在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的结业典礼上，费孝通强调，“学习社会学终究是为了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达到富民强国、改造社会的目的。不赞成只在书斋里讨生活、为社会学而社会学的做法。”

其实更早之前，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为重建与恢复之后的社会学如何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续统计数字都没有，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

“经世致用”也一直是费孝通的学术情怀。费孝通曾说，“我的一生经历过无数重大的历史变革，但最重要的当属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与祖国的富强和发展紧密相连。”

在苏宛看来，这种“经世致用”的偏向是明智和保险的，对于草创时期的社会学学科幼苗来说，最紧迫的是扎下根来，而不是纠结在学术概念上的争辩。

一次串门引发的念头

“他在中国社会学恢复时期的辛劳贡献历历在目，他与其他前辈共同的付出和担当，使全国社会学的发展受益万千。”2018 年 2 月 19 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杨心恒因病逝世。中国社会学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发来的唁电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杨心恒对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作出的重要贡献。

1979 年 4 月 25 日，在天津市西郊区委工作的杨心恒正式调回南开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哲学系的还是一些教学化的公式，重新回到教学岗位的杨心恒不愿意再讲哲学，一次串门经历改变了他的方向。

杨心恒后来回忆，去哲学系教师童坦家串门的时候，童坦夫人盛英提议他去搞社会学，“她说话不打弯儿（天津话，指说话直）。可是恰恰遇见我这个没有主见的人，我就信了。”在几个月后的哲学系征求发展新学科专业的讨论会上，杨心恒和其他两位同事一起提议了社会学。尽管这时的社会学刚刚恢复名誉，但仍被认为是“出身不好”，毕竟这个学科在 1952 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

一年多之后的 1980 年 8 月 10 日，费孝通来到南开见滕维藻、郑天挺等“西南联大时期的老朋友”。费孝通所说的这些“老朋友”当时已都是南开大学的校级领导。那次会面，南开大学答应了费孝通在南开大学办社会学专业的提议。杨心恒和苏宛也在场，正是他们邀请了费孝通来南开，为此杨心恒等人没少在北京天津两地跑。恰巧的是，在此前不久，苏宛已经就哲学系发展社会学专业这件事向学校提出了申请。

费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981 年 2 月 26 日早晨，天津还很冷，费孝通裹着棉外套，呵着白气，在南开大学主楼 319 教室的讲台上操着浓浓的吴音，讲着自己的学术经历。